

新中国建国以来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外交政策与实践

李 婧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湖北省武汉市, 430072; amylj0828@gmail.com)

摘 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不同的背景形势下我国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呈现出阶段性特点, 共可分为五个历史时期, 即友好期团结克制、低潮期以战维和、缓和期曲折修复、发展期乍暖还寒和进入新世纪后日臻理性成熟的新时期。以和平谈判为解决之道、兼顾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着眼长远实行建设性管控是解决边界争端的外交经验总结。新时期应对中印边界问题, 我国外交可从秉持互利互谅原则、适当搁置争议、健全高层交往机制、积极推动公共外交等方面着手。

关键词: 中印边界; 外交政策; 外交实践; 历史经验

引言

“领土”是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之一, 而划定一国领土范围的便是其“边界”, 可见“边界”对于国家至关重要的意义。在新中国成立后 70 余年间, 经过漫长的外交谈判, 我国陆续与 12 个陆上邻国划定边界。纵观绵延万里的陆地边界, 至今只有同印度、不丹两国的边界未能定界, 而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占据着首要位置。棘手复杂的中印边界问题, 对于我国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已成为我国外交的侧重点之一。

1 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外交政策与实践发展历程

建国以来, 中印边界荆棘丛生。在不同时期的国际环境与国内形势下, 我国外交政策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

1.1 友好期: 维持现状, 团结克制 (1949 年-1958 年)

建国初期, 百废待兴。巩固国家政权、争取祖国统一、恢复经济生产等一系列重要任务摆在眼前, 边界问题被暂时搁置。此外, 由于对边界的具体情况掌握有限, 加上紧邻东北边境的朝鲜战争爆发, 我国政府并没有立即着手处理陆上边界问题, 而是基本采取了维持现状的策略。国际方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主要安全压力来自于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 为了打破西方阵营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 争取其他更多国家的支持与承认, 避免因领土争议而影响睦邻友好的对外关系, 我国政府从宏观战略角度出发, 在坚持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上, 严谨处理争议领土, 同意维持尚未划定的边界现状。

周恩来在 1954 年 6 月第一次访问印度时, 就中印东段边界的印度所谓“麦克马洪线”指出: 这是殖民主义遗产, 是在地图上随意划出的, 因此中国政府不予承认; 目前两国均应维持现状, 不要越过该线。在 1955 年的万隆会议上, 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同一些陆上邻国的部分边界尚未划定, 且已准备同周边邻国确定相应边界; 但在此之前我国同意应维持现状[2]。1954 年 4 月 29 日, 《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于北京签订, 打破了中印发展瓶颈, 开启了两国交往蜜月期。

虽然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相互支持, 但在边界问题上仍旧暗流涌动。印度利用中印亲善大环境, 台上亲热台下掠夺, 大肆扩张其北部边界领土、暗中支持西藏叛乱; 而我国为求团结, 维持与印度的友谊, 选择了克制的中印边界政策。

独立后就继承了英国殖民主义衣钵的印度在边界不断执行“前进政策”, 妄图单方面把边界推到其“理想边界”[3]。印度军队 1954 年 6 月占领了中印中段边界, 即我国西藏达巴宗的乌热, 两国军队在边境上首次出

现了对峙局面。之后印度变本加厉，在两国边界东、中、西段均大肆蚕食侵略，更是把一切以实线堂而皇之地划入了印度版图。我国政府并非毫不知情，但为服从于中印整体关系友好这个大局，边界政策很难做到积极去反制。外交部指示：我方对边界的基本方针是外交上坚持立场和原则，边防上制止印军入侵，但目的是团结，不能激化矛盾；现在彻底解决边界问题条件不具备，争取将来通过外交解决[4]。

1.2 低潮期：态度趋强，以战维和（1959年-1975年）

这一时期我国在国际上与美国敌视依旧，与此同时，和苏联裂痕加深；国内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尚未解决。经历了建国初期的发展艰难起步阶段，我国政府得以开始关注与邻国的边界问题，并决定尽快妥善解决，以维护边疆的稳定局面。1959年8月25日，印度边防军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地区挑起了第一次武装流血冲突；随后又于10月20日，在西段的空喀山口挑起了第二次流血冲突。朗久事件严重动摇了中印两国领导人之间互信的基础。朗久事件后，周恩来在给尼赫鲁的信中，态度有了明显变化，阐述麦克马洪线非法性的语调更为果断明确，不承认该线的语气更为坚定有力。周恩来明确表示，“麦线”是英国殖民政府对中国西藏地方执行侵略政策的产物，是不合法的，中国中央政府从未承认过[5]。

1961年11月2日，尼赫鲁召开会议，将在中印西段边界地区逐步蚕食我国领土的“前进政策”拓展到整个中印边界线上。同日，我国照会印度，对印度军队近几个月“在中国的磔穆绰克地区，不断继续扩大非法侵占和巡逻的范围”等一系列影响两国边界稳定的行为表示抗议，并且警告印度军队这种粗暴破坏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可能已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中国政府必须指出，如果印方把中方的克制和忍让当作软弱，那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6]。我国政府多次照会印度方面，提出抗议和警告，为了维护中印边界的稳定，几乎想尽一切办法，寻求和平谈判解决之道，力争避免武装冲突。到1962年8月底，印军已在我国境内部署了百余个据点，最近时双方相距仅几十米甚至是几米，与我国哨所“面对面”而立；在有些地点更是穿插到我军背后，相互交织对峙。我国党中央高层决定采取“决不退让，避免流血，武装共处，犬牙交错”的十六字方针，展开反印军蚕食的斗争，避免大规模流血冲突发生。

1962年9月在中印边界东段发生择绕桥流血冲突，印军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我国军队5人牺牲、3人受伤。此次事件表明与印军的正面“武装冲突”已避无可避。此后毛泽东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中国的自卫反击是警告惩罚性的，目的在于以战维和，以战促谈[4]。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共分为两个阶段展开：在第一阶段，我军在东段地区歼灭侵入我国境内的印军第七旅，越过“麦线”控制了达旺地区；在西段清除了印军非法设在我国境内的多个据点，恢复对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进入第二阶段，我军进一步前推，在东段占领控制了“麦线”以南的大片地区，在西段则肃清印军的所有侵略据点。在战争取得首次阶段性胜利后，周恩来站在我国政府立场发表声明，强调中印两国应基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反帝斗争共同立场及亚洲和平稳定大局和亚飞团结，竭力停止军事对抗，重启边界问题和平谈判[7]。在第二阶段作战目标达成获胜后，面对周边国家的关切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为展现和平诚意、争取政治外交主动性，遵循中共中央一以贯之的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主动做出重大和解。1962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重要声明：《为扭转中印边境冲突严重局势，促进三项建议实现，维护中印人民根本利益，我国政府决定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公布我国政府决定。明确写道：中方自1962年11月22日零时起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自1962年12月1日起，中方将沿1959年11月7日双方的实际控制线单方面主动后撤20公里[8]。我国政府以政治智慧化解边境争端战略远见，是中国在政治外交上进一步取得了主动。该声明发表后，中印边界全线地区实际上停止作战，以战维和的目标得以实现。此战后印度收敛此前的前进势头，边境地区归于平静。我国政府的主动停战后撤处置，既缓和了两国边界紧张形势，又为自己赢得了国际舆论支持，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中印边界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后，印度在国际上加强与美、苏友好，进一步反华排华。截至1976年，两国虽然名义上还保持着所谓的外交关系，但战前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交流几乎全部中断。我国从内、外两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减轻印度对我国边界安全带来的隐患。首先，从印度国内牵制其外交精力。对印度内部的叛乱和反抗组织给予物质援助、人员培训以及公开声援等支持[9]。其次，争取亚非新兴民族国家对中国立场的支持。加强与印度邻邦如巴基斯坦、尼泊尔等国的友好关系，极力削弱印度在周边的影响力；派

出外交使团访问亚非多国，仅 1963 年 12 月至 1964 年 3 月短短一段时间，周恩来亲自率团出访了遍布亚洲、非洲和东欧等地的共计 14 个国家。

1.3 缓和期：恢复会谈，曲折修复（1976 年-1990 年）

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后,以美苏为代表的冷战局势出现了缓和趋势,中美关系的解冻也为地区与世界和平带来了更多的确定性因素。我国的外交有了较大的发展,改善周边环境成为外交工作的重要方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了科学分析,认为世界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大战不会打。

1976 年 7 月和 9 月,印中两国先后派回驻对方大使,两国关系逐步得到改善。印度外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于 1979 年 2 月应邀来访,这是中印边界战争后时隔 17 年来首位访问中国的印度外长。时任我国副总理的邓小平接见了印度代表团,他表示应当秉持求同存异原则、推动双方关系正常化,主张通过外交渠道协商解决领土争议[10]。为打破僵局,邓小平向印方提出一个解决领土争端的“一揽子”方案——以中方在东段地区的灵活立场,换取印方在西段争议区的相应让步。但印方并未接受,这项具有战略平衡性的方案在当时未能达成共识。1981 年 6 月,我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黄华率团到访新德里,与印方开展专项对话,双方达成重要共识,一致同意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中印边界争议,决定重启谈判,确立了每半年举行一次的副部长级定期对话机制。将和平解决争议的共识转化为制度性安排,彰显两国通过渐进方式管控分歧的政治智慧。

中印两国恢复解决边界问题的和平磋商机制后,在 1981 年 12 月至 1987 年 11 月的近六年间共举行了八轮副部长级会谈。由于印方坚持分段分别解决,中方则主张一揽子解决,双方未能达成一致。1988 年 12 月,印度时任总理拉吉夫·甘地展开历史性破冰之旅,成为自 1962 年边境冲突后首位踏上中国领土的印度最高领导人。两国总理进行了密切对话,双方一致认为,应当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双方建立了边界问题的联合工作小组以及签署了科技文化合作交流的计划。

1.4 发展期：取得进展，乍暖还寒（1991 年-1999 年）

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国际社会由两极对立转为以美国为首的“一超多强”新格局。我国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为处理陆地边界问题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共中央基于国际战略全局研判,提出“睦邻友好、稳定周边”的外交工作方针,展现出大国解决边界争端的政治智慧,为继续推动解决领土边界争端创造了有利条件。

作为同处亚洲的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逐步稳定的发展势态。自 90 年代后,中印双方采取积极的姿态,力求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合理的方案来解决边界问题。

1991 年 12 月,李鹏总理应印度政府的邀请访问新德里,此次访问是自周恩来总理于 1960 年访问印度以来,时隔 31 年后中国政府首脑对印度的第一次访问。李鹏总理会见了印度总统拉马斯瓦米·文卡塔拉曼及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双方讨论了边界问题并达成共识:两国同意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保持实际控制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同意将两国边防人员不定期会晤改为定期会晤[11]。中印两国再次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性和国际普遍性。李鹏总理的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此后数年间,中印就两国边界问题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定,中印关系也因边界协定的一步步确立而渐向和谐。在构建双边互信基础的进程中,两国于 1993 年 9 月 7 日签订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为军事接触风险建立预防性法律框架。该协定有利于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和两国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首次使用的“实际控制线”这一说法,也传达了印度政府的改善中印关系的愿望和诚意。1996 年 11 月 28 日,我国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江泽民历史性首访印度这个南亚邻邦,打破了两国元首互访的长期空白。双方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达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首次在军事领域就中印实控线问题建立信任措施。

然而,印度于 1998 年 5 月的核试验使中印关系再度受挫。印度将核试验的托词放在中国,在印度进行核试验前后,印度领导人不断对中国进行攻击,制造核试验“有理”的舆论及“中国威胁论”,妄图将脏水泼在中国的头上。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声称,作为邻国的拥核国中国,曾于 1962 年在中印边境地区对印度发动

了“武装侵略”；且由于边界问题久悬未决，一种不信任的氛围长期笼罩两国关系[12]。中方对此说法深表震惊，予以强烈谴责。

1.5 新时期：全面发展，成熟理性（2000年至今）

21世纪帷幕初启，全球权力体系迎来系统性重构。地缘政治博弈态势升级与多极化进程加速，标志着国际秩序正经历历史性转型。亚洲的战略地位显著提升，中印两国作为新兴力量的代表快速崛起。两国审时度势，从战略高度出发，都认识到睦邻友好的重要性。

2000年是中印建交50周年，以此为契机，中印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双方领导人的互访也进一步增多，并就加强中印关系的发展和通过谈判顺利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达成了一些重要共识。2002年11月，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第14轮会谈展开，就绘有中段边界双方实际控制线的地图进行正式交换，并且联合工作小组将依照计划，就东段和西段边界问题开启进一步磋商。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开展对华访问，双方共同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该宣言不仅确立了推动两国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应该遵循的原则，更是印方以书面形式明确承认了西藏领土主权归属中国。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宣言写明，两国同意应通过共同努力保持边境地区的和平安稳，并重申致力于继续执行为实现这一目的所签订的有关协定，具体包括澄清双方实际控制线；同时同意各自任命国家特别代表，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13]。10月下旬，两国边界问题的中方特别代表戴秉国（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和印方特别代表米什拉（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国家安全顾问），在新德里举行首次会晤。之后双方又于2004年1月、7月和11月，密集进行了三次会晤，就解决边界问题所需的指导原则进行了更为有益的探讨。

2005年4月9日至12日，应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邀请，中国总理温家宝对印度展开正式访问。双方通过高层会谈，围绕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各种议题展开磋商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多项共识。访问期间，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同步举行了第五会晤，经商议最终一致形成关于边界争议解决的政治指导原则。两国代表共同签署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协定明确，双方同意依据互相尊重、互相谅解的原则，通过合理调整和一揽子方案解决边界问题；双方将综合考虑战略利益、安全原则、历史依据、民族感情、实际困难及边境地区情况，确保边界沿清晰易辨的地理特征划定，并维护定居人口的利益；在最终解决前，双方承诺尊重并遵守实际控制线，保持边境和平稳定[14]。这一协定的签署标志着两国边界谈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12年1月17日，为了进一步丰富机制化会晤、磋商和协调机制，中印两国签订了《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周边外交的重视程度持续不断提升。在2013年10月举行的我国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这一重要理念是我国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开展周边外交工作的标志性指导方针。自2013年以来，中印两国本着上述理念，实现了频繁多次的高层互访、外交和谈、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较好地处理了双边关系及一系列分歧。2014年9月和2015年5月，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进行两国最高领导人互访，将中印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双方将解决边界问题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再次确认了要共同管控边界分歧。中印在处理边界争议上创造了一个范例，即可以用“两轨思路”处理争端问题与全面发展的关系[15]。这种方法表明，尽管存在边界争议，两国依然可以在其他领域加强合作，推动全面发展，同时通过沟通与协商逐步解决分歧。

值得一提的是，在经历长达72天的对峙后，洞朗事件通过外交手段得以和平解决。中方对洞朗事件的应对和处置，既维护了领土主权，又把握住了发展中印关系的大方向，对外展示了中方解决包括领土争议在内复杂外交和国际问题的智慧和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誉[16]。为处理中印边界问题提供示例，成功运用了外交“两轨思路”，这是两国理性的胜利，两国边界外交进一步走向成熟。

2 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外交经验

2.1 始终以和平谈判为解决之道

处理边界争端涉及我国与邻国的关系及两国各自的发展问题，应与我国和平外交的基本方针紧密联系，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主席曾经提出：“只要双方友好，边界问题就好解决[17]。”和平手段是解

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基础。边界问题作为一个多维复合性矛盾聚合体，涉及政治、军事、外交、民族、宗教等各个方面，不能单纯企图依靠武力解决，任何军事冒险都将可能触发系统连锁性风险，应努力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等方式解决。纵观我国处理中印边界问题的外交方针政策发展，都始终将和平谈判摆在首要优先位置。

2.2 兼顾国际国内发展形势

在应对中印边界问题时，我国外交采取了一种统揽全局的危机处理策略。我国政府始终以全局性视野统筹研判，超越单纯的双边摩擦范畴，将它放在中国外交与国际形势的战略全局下，据此确定自己的方针政策[18]。边界问题涉及一国的对外关系和国家安全，既要协同周边稳定与发展的布局，也要通过多边协作机制凝聚共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构建各方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此外，中印边界问题关乎两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也要从有利于创建我国国内和平发展环境的角度考虑，静待问题成熟，寻找有利时机一举解决。

2.3 着眼长远实行建设性管控

我国政府在边海外交工作中始终坚持着眼长远和全局，不逞一时一事之快，在稳妥把握国内和国际发展大势的基础上，保持战略定力，守住政策底线，营造必要氛围，创造基本条件，等待时机成熟时再妥善解决[16]。对于中印边界这个高度敏感复杂的问题，因一时无法解决，我国主张维持现状并采取有效措施管控争议，避免矛盾激化和升级。通过我国有效引导和管控，中印边界争议地区总体保持了和平安宁，未对双边关系及两国发展造成重大影响和冲击。

3 对当前及未来我国处理边界问题的对策建议

3.1 秉持互利互谅原则，灵活变通合理划界

中印边界问题由来已久，在长期的争夺过程中，边界上的实际控制线发生过几次变化。自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中印两国的实际控制线基本稳定。在实际控制线已经稳定的情况下，任何一国想要求更多的国土面积都是不现实的。基于这一战略现实，我国政府曾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仍具可行性，所提倡的互谅互利原则是解决边界问题应始终遵循的。我国外交应采取更为灵活变通的策略，在现有控制线的基础上加以调整，合理划定中印边界。

3.2 牢记“底线思维”，适当“搁置争议”

我国政府坚持的底线是“主权在我”，主张在中国领土主权范围内的任何行动都不容别人说三道四。同时，我国政府提倡不因边界问题而影响两国其他方面的往来。由于完全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目前应搁置边界争议，推动其他领域合作发展。积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的交流合作，也可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创造合适条件和良好氛围。

3.3 增进战略互信，建立健全高层交往机制

中印关系是世界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要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处理双方关系。中印双方可以通过在国际政治领域互相支持，如中国支持印度在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等途径，建立政治互信。两国应建立军事互信谅解与合作机制，进一步在国际和地区安全领域开展广泛合作，积极寻求和建立新的合作运行机制，通过协同合作增加政治互信[19]。两国还应建立高层交往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高层交往的作用，通过各渠道保持双方领导人之间的经常性往来。要高度重视首脑外交，健全首脑外交新模式，坚定双赢合作的政治理念。从过去的首脑外交中不难看出，建立领导人常态化互访机制，对解决中印因边界问题造成的障碍因素，具有积极作用，能有力促进两国关系的稳健发展。

3.4 顾及民众感情，积极推动公共外交

就现阶段而言，中印双方相互了解还远远不够，尤其是自1962年边界争端后，两国间的隔阂仍未完全消除，特别是民间层面，两国民众对边界历史、两国国情及国际形势的认知并未深入。因此在处理边界问题时，

我国还需考虑国内民众的感情,获得大众的理解与支持。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要积极推动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基本内涵可概括为民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20]。两国政府应在媒体舆论、民间经济文化交流领域进行正向引导,使宽容、理解和包容成为中印两国国家和人民互动的主流价值观念,营造良好的文化外交生态。我国外交要明确“传递中国和平发展的价值观及和谐理念”这一目标定位,向印度政府和民众释放中国善意与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多层面全方位地推进公共外交活动,开动“一带一路”快车,推进经济能源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调动政府、社会精英、普通公众、媒体舆论等不同主体的积极性,形成强大合力消除隔阂,以期在处理边界问题时获得两国民众的理解与认可。

参考文献

- [1] 邓红英. 1949 - 1958 年中印边界纠纷及其处理[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4, 21(3): 72.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130.
- [3] 聂宏毅. 中国与陆地邻国领土争端问题研究(1949 - 2007)[D]. 北京: 清华大学, 2008: 119.
- [4] 吕昭义, 孙建波. 中印边界问题、印巴领土纠纷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108, 194.
- [5] Documents of the Sino-Indian Boundary Question[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60: 6.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J], 1961(17): 319.
- [7] 《人民日报》社论. 为停止边境冲突、重开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N]. 人民日报, 1962-10-24(1).
- [8] 《人民日报》社论. 为扭转中印边境冲突严重局势、促进三项建议实现、维护中印人民根本利益, 我国政府决定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N]. 人民日报, 1962-11-21(1).
- [9] 随新民. 中印关系研究: 社会认知视角[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192-193.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邓小平年谱 1975 - 1997(上)[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489.
- [11] 《人民日报》社论. 中印联合公报[N]. 人民日报, 1991-12-17(1).
- [12] 张锦芳, 胡光耀. 究竟是谁在搞威胁? [N]. 人民日报, 1998-05-18(4).
-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EB/OL]. [2024-12-03].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3/content62251.htm>.
- [14] 《人民日报》社论. 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 介绍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N]. 人民日报, 2005-04-14(4).
- [15] 石源华. 中国周边外交十四讲[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261-262.
- [16] 海民. 我国边界海洋问题与中国特色的边海外交[J]. 边界与海洋研究, 2018, 3(6): 13, 14.
- [17] 毛泽东. 毛泽东外交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445.
- [18] 黄想平, 齐鹏飞. 浅析中国政府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危机处理[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6, 13(1): 84.
- [19] 杨冬云. 中印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建[J]. 社会科学文摘, 2016(3): 120.
- [20] 何兰. 强化公共外交, 减少舆论噪音[J]. 现代国际关系, 2010(11): 21.